

榕光社主席聶揚聲 盼長者尊嚴活 放心去

「夕陽送行者」為獨居長者辦身後事

據2021年人口普查統計，香港共有145萬名65歲及以上長者，較2011年增加逾51萬人，而在只有長者的住戶中，有逾18萬戶是獨居長者住戶，佔長者整體約12%。若獨居長者去世，無親屬認領的遺體，便會在半年後移送沙嶺公墓，下葬後只得一塊沒有名姓，刻着一組號碼的矮墓碑。有一班人，為令長者逃脫這孤單無奈的終局，以「夕陽送行者」的身份，自願送逝者最後的旅程，為他們的人生畫上充滿人性尊嚴的句點。◆採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◆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



◆聶揚聲與義工們為老人測血壓。



◆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在鑽石山紀念花園撒骨灰。



◆聶揚聲和榕光社護老院的老人在一起。

榕光社主席聶揚聲的名片上，在「主席」頭銜的下面，也寫着「夕陽送行者」的稱號。30多年前，他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開始擔任義工，由此接觸到榕光社，而他和獨身長者的緣分，是從1980年代末慈雲山邨重建開始的。

獨身長者身處「隱秘角落」

榕光社前身是榕光社老人服務團，在1988年創立。最初聶揚聲被介紹到榕光社，就跟其他義工一起去慈雲山邨「拍門」，為的是找到邨內無兒無女的老人，告訴他們重建的情況，幫他們揀屋，做安置安排。「在30多年前，無兒無女的長者通常是很隱蔽的，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像現在這樣多的慈善機構和社工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很多人心底自卑，不願與人打交道。」在「拍門」的過程中，龐大的獨身長者群體暴露在義工們眼前，往來多了，得到他們的信任，聶揚聲發現這些長者因為平時無依無靠，每次見到他們都會很開心：「後來這些長者有的原區安置，有的搬去了附近其他屋邨，我們覺得應該繼續服務讓他們，於是開始了義工探訪、陪診的服務。」1985年，陳德森導演為榕光社籌款，租下位於黃大仙的中心，榕光社才有了一個固定場地，以開展地區性工作。如今榕光社除探訪、善終、陪診服務外，亦有派飯、賑醫施藥等。

在跟進了一些獨身長者個案之後，榕光社的義工們發現他們最大的困擾，就是憂心自己將來的「身後事」應該怎麼處理。聶揚聲說：「中國人向來重視後事，我們不想長者一世淒涼，最後還要葬去沙嶺，只得一塊墓碑和一個Number。於是在2005年左右，榕光社開始計劃善終服務，我們幫過身長者辦喪事，讓他們有葬禮、有遺像，有牌、有名字。」

「夕陽之友」托舉最後一程

榕光社的善終服務「夕陽之友計劃」幫助獨身長者免費辦理身後事務，所處理的個案通常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榕光社長期跟進的長者，他們在生時就簽下委託書，長者對葬禮有何要求和需要，都會在委託書上寫明，如宗教儀式、安葬形式、地點等；另一種則是由警署、社會福利署及醫院管理局等政府機構轉介的個案，逝世長者和榕光社義工的第一次見面，便是在殮房認屍時，聶揚聲把這稱作「生死兩相交」。

「我接的第一個殮葬個案，是在國外的醫院。」儘管榕光社事先從逝者朋友那裏拿到逝者的身份證用以認領遺體，但國外程序複雜，儘管有身份證，醫院還是不予承認，延至三個月後才開始調查，確認死者沒有家屬，才將遺體交給榕光社。聶揚聲無法忘記那具因為冷藏過久而發黑的遺體：「很多人問我們怕不怕，其實並不是恐懼這樣的感受，要真正做了義工才知道，更多的是沉重，有很重的責任背負在身上，因為你是唯一可以幫逝者的人。」

有時候，死亡將活着的人們連在一起，也有些曾有關聯的逝者，因為榕光社而團聚一處。聶揚聲曾處理過一個跨境個案，約五年前，一位香港人在武漢病逝，社會福利署轉介予榕光社處理，於是榕光社找到逝者的大哥，請他出具授權書以便認領遺體，直到見面時才發現，他們早已相識，原來兄弟二人的小妹



◆榕光社用於賑醫施藥的醫療車，常到訪基層地區。

於數月前過世，也是由榕光社處理的後事。因授權書需要醫生在場時簽署，以確保是長者真實意願，於是再約醫生，再等，大哥卻猝逝了。跨境認屍的過程也頗為周折，因時隔太久，榕光社需向醫院繳納一筆巨額的停屍費，最後才終於認領並火化。在武漢最後一晚，骨灰盒就放在聶揚聲的酒店房間裏，「你問我怕不怕，我不害怕，因為我在幫他。」第二天返港，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將逝者的骨灰撒在鑽石山紀念花園，讓他和兄長、妹妹長眠一處。「生前一家人不在一起，但死後可以在一處，這是一件好事。」聶揚聲說。

慈悲為懷破例辦理

儘管「夕陽之友計劃」的服務對象是65歲以上的獨身長者，但他們偶爾也會破例。「有個個案是YMCA救助的邊青，在支援輔導的過程中，這位青年最終還是因為感情問題而自殺了，YMCA沒有辦葬禮的經費，我們就接手了。另一個是一位一歲的小朋友，其父母是持『行街紙』的斯里蘭卡人，小孩不幸過身後向慈善機構求助，機構再轉介紹給我們，我們亦為孩子舉辦了葬禮。」聶揚聲說。「夕陽之友計劃」不論宗教、國籍等因素，有時即使年齡不符也會破例辦理，這也是榕光社一直以來不向政府申請資助的原因：「如果拿政府資金，雖然我『跑數』不用那麼辛苦，但在規則限制方面就會定得比較『死』，無法同政府講人情，我們就無法為任何人破例。」面對逝者已逝，聶揚聲心中的天平，最終還是向慈悲而非規則傾斜。

前幾年的疫情帶走了不少長者的生命，聶揚聲回憶那時的逝者大約有以往的三倍之多，因殮房遺體積壓，甚至動用了貨櫃箱做成冰櫃來保存遺體。聶揚聲說其中大部分逝者，並不是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亡：「新冠疫情真正影響的是老人的情緒和精神，他們無法出門，在家望着天花板度日，導致抑鬱使器官加速衰敗。」他也很感激那時看到榕光社廣告後向他們捐贈環保棺的善長們：「原本想籌二百副，但最後籌到了六七百副。」



◆榕光社創會主席林桂霞（左）和聶揚聲在工作中。

辦葬禮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，但在榕光社的義工們這裏，所有的流程都要熟稔於心。榕光社創會主席林桂霞介紹：「我們通常是兩個義工一組，因為要相互觀察有無做錯，這些東西絕不能錯。我們實行『師徒制』，師父先帶徒弟義工做五次，然後第六次徒弟才自己開始做，師父在一旁監督。」有時一周接到三四個求助，一組義工要同時負責不止一宗個案。義工長期跟進長者，彼此間有感情，因此榕光社對治喪都是親力親為，而不交予長生店來做，背後的文件程序其實頗為繁雜。

「在醫院殮房核對手牌、認屍，然後在逝者逝後的第三个工作日，前往醫院領取醫學證明，提交到殮儀館，選定殮葬形式。之後便去胡忠大廈登記處申請死亡證，然後在隔離食環署窗口申請火化日期，給個Code，再拿去殮儀館，殮儀館從申請起的第十五日給定火葬日期予你。然後認領遺體、簽收，疫情以前我們還有守夜儀式，第二天便火化。再過七日去紅磡領取骨灰，若要綠色殮葬，就要申請取盅、確定撒灰日期，除了海葬的，都要盪造碑廠訂墓碑。」聶揚聲說，因為做習慣了，所以也不覺得流程繁雜，他記得早期申請火化要前去食環署排隊，甚至還有黃牛在那裏取籌來賣，相較之下現在已經很好，只是要跑多幾次。「因為這些都要在辦公時間完成，上班族義工難以做到，我們的『夕陽送行者』大多是退休人士。也許程序簡化不了，我想唯一可以的就是希望程序都可以電子化，這樣不必四處奔走，可以節省很多時間。」

冀喪葬文件申請電子化

▽榕光社除探訪、善終、陪診服務外，亦有派飯、賑醫施藥等。

籌備十餘年辦護老院 囑職員以義工心態工作

多年的探訪，讓聶揚聲和榕光社義工看到許多長者在護老院生活的悲苦與艱難。早前上映的電影《白日之下》重提大埔劍橋護老院「天台集體沖涼事件」，這也是聶揚聲心中難以忘懷的心結。既有曝光在白日之下的醜惡，就有許多仍見不到光的慘劇，聶揚聲說：「以前探訪時，見到有不能行動的老人家，雖然有領綜援，有『特別膳食』（即奶粉和一些營養輔助品），但沒人為他準備，只能自己打開奶粉罐，舀兩勺倒入口中，然後再喝一口水。」

然而想要改變這樣的情況，義工們即使想做些什麼也多有掣肘，聶揚聲有次在北角一間護老院探訪，老人向他們訴說住在那裏的艱難，義工們便提出替她向護老院投訴，但那婆婆立刻反面，還叫他們永不要再去看望她。聶揚聲反思道：「確實是我們思慮不周，如果投訴，我們離開後，護老院職員會對付她，對她更差，受罪的人

是她。」從那時起，聶揚聲就希望可以以榕光社名義開一間護老院，接納那些無所依靠的老人，並善待他們。

而今，這個願望終於實現。位於太子花墟附近的「榕光社護老之家」今年3月取得牌照，現已經有一些榕光社長期跟進的長者在這裏安居。不似其他護老院的擁擠閉塞，這裏稱得上窗明几淨，寬敞闊落。「早在15年前我們就想做護老院，一路有人捐款，我們便儲起，最後買下這裏的單位，又獲得香港賽馬會捐款，請到設計師，裝潢得漂亮，都是為了可以長久運作下去。雖然能容納的不多，但是會完全按照我們的理念來。」聶揚聲說：「我經常叮囑職員，你們在這裏工作有兩個身份，一是職員，二是義工，你有工作的職責，但也要有義工慈悲

悲善良的心態。」

須每月籌款維持運作

「榕光社護老之家」現時靠捐款和入住老人的綜援運作，但也有少數老人，並無領取綜援，榕光社亦會免費接納他們入住。「有些獨身長者有數萬元的積蓄，政府就不會批綜援給他們，他們不願用掉那筆錢，因為覺得那是自己的保障，我們一樣會接納他們住進來。」聶揚聲明白長者缺乏安全感的心態，他笑說：「其實即使有綜援，也還是不能讓護老院達到收支平衡，我惟有努力出去籌款補缺，『跑數』多與少，也計較不到那麼多。」在他心裏，只要老人住得安樂舒服，就是值得的。聶揚聲還在計劃開辦第二間護老院：「我們看

中元朗一間廢校，周圍環境很好，大概可以安排200個位。」目前他正就場地問題與政府交涉中。「很多人問我為何這樣拼命？我說我有能力就多做些，因為人是講不定的，不知可以做到幾時。」他說自己做「夕陽送行者」，偶爾也會很「灰」，因為如果是幫助那些年輕人或是孩童，他們會成長，會有未來，而他們幫助長者，只能看到一個人如何墮落。「我幫的人，最終都會走。但是如何『灰』，我都要繼續做。」

